

· 社会转型发展研究 ·

中国现代化道路的历史与政治之维

陈明明

摘 要:晚清以来的中国现代化是在全球资本主义扩张的格局中起步的,主权、政治权威的衰败和社会的低组织、无组织化状态是这种结构强制的结果。由政治失败而引发的理论和实践的探索,以及为解决政治失败而兴起的战略和制度的创新构成了中国现代化的探索过程。中国现代化的经验表明,拥有一个强大政党所领导的、通过社会革命创造的、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的自主国家、有效政府、平等社会和治理中心主义政策文化,是现代化成功不可或缺的必要条件。中国现代化运动中呈现的体制、经验和方案同现代化的一般条件和发展逻辑具有内在的亲性和关联性,既体现了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也反映了基于历史与国情的中国特色,其意义是特殊的,也是普遍的,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

关键词:中国式现代化; 自主国家; 有效政府; 平等社会; 治理中心主义

近代以来中国的现代化是一部经由政治失败而引发的理论和实践的探索,以及为克服政治失败而进行一系列战略选择和制度变革的历史。在中国人和西方人正式接触的 19 世纪,中国作为一个统一国家已经存续两千多年,为什么在“新多国时代”的自强运动中却一败再败?这启发了中国人对国家与现代化的重新思考。中国人在很长时间里相信,中国要与列强比肩,需要向西方学习,把自己变成一个在财货器物 and 制度形态上类似于西方的国家,但中国人很快发现,西方对中国的资本输出和“市场准入”以及相伴随的政治、文化侵略并不是要把中国变成一个独立自主的“文明国家”,而是要把中国变成国际价值链下端的依附性国家。要改变这种态势,就需要改变中国的世界位置,要改变中国的世界位置,就需要改造中国的政治生态,要改造中国的政治生态,就需要有一个强有力政党的领导,通过发动深刻的社会革命,建构和奠定中国复兴的基础条件。这些条件包含自主国家、有效政府、平等社会和治理中心主义政策等内容,它们构成了中国现代化的时代主题,也成就了世界现代化史上引人瞩目的中国特色。

一、中国现代化之困的三个视角

现代化是人类社会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的历史过程,是物质生产方式变革及其导致的交往方式、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的剧变,每一步都体现了“抗拒与变迁”的纠缠、“新质对旧质”的叠代。现代化论者布莱克(C. E. Black)将其简化为四个阶段:现代性的挑战、现代化领导的巩固、经济和社会的转型、社会的整合。^① 现代性的挑战意味着理性的经验的此岸的知识对传统观念和体制的质疑、攻击,预示着旧秩序的合法性被侵蚀和动摇。在持续几代人的对抗和斗争中,

^① 布莱克:《现代化的动力》,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95页。

主导社会发展的权力终于从传统精英的手里转入现代化精英的手里,现代化精英利用控制的优势资源,推动经济增长和社会变革,使原来占主导地位的乡村农耕生活方式逐渐转变为城市工业生活方式,最终导致整个社会发生不可遏制、不可逆转的重组,在新的经济社会基础上建立起与之相适应的相互依存的社会结构形态。这个基于西方经验的认识被认为是反映了现代化的一般发展模式。

比较研究表明,中国的现代化显然难以被简单纳入上述发展模式。这种阐释结构和中国自19世纪中叶被西方列强打开国门以后的身份特征和存在问题有着重大差异。中国的现代化和西方的现代化有何不同?现代化时序的先后关系对中国而言隐含着什么样的空间关系?为什么说中国的现代化之困盖因政治失败?在20世纪70年代,经典的现代化理论已经受到挑战,线性论(或单线论)和西方中心论最为人所诟病。在诸多批评中,马克思主义学派或受马克思主义影响的理论分析堪称最为深刻。其中,在关于中国现代化困境的观察中,这种分析站在中国历史发展及其所处的世界方位的交汇点上,有三个视角颇具方法论的意义:

第一,世界经济格局的视角。发端于15、16世纪西欧的所谓现代性因素,最早借由新航路的开通、殖民和贸易,而后通过战争和资本强制扩展到全世界,这种现代性包括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民主化、世俗化,被认为代表着普遍性的潮流,它所到之处,摧毁了传统(农耕文明)的藩篱,新建了“现代”(工业文明)的秩序,伴随着技术、观念和制度的传播,把彼此隔阂的世界变成一个“现代的”、有机的、整体的“文明世界”。但是,这个“文明世界”的总格局是“东方从属于西方”。^①作为资本主义全球扩张的过程和结果,西方列强并不是要把中国变成一个西方式的国家,而是要把中国变成资本主义世界体系食物链下端的殖民地。在这种态势约束下,中国社会经济在资本主义全球扩张下发生了适应国际资本扩张需求的深刻变化,形成了有利于外来资本增殖和商品倾销市场的“现代部门”和输送初级原料资源的“传统部门”,从而形成外国资本、官僚资本、民族资本以及地主经济共同组成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②依附理论把这种世界格局界定为“中心—边缘”结构,其最激进的流派由此断定,结构的作用必然导致中心可以自主发展,边缘不可以发展(弗兰克、多斯桑托斯),或如稳健的依附论者所说的至多只能是依附性发展(卡多索、法莱托)。^③中国的现代化一开始就处在这种世界格局的强制之中。看不到这一结构的强制,就难以明白中国的现代化何以起步维艰。

第二,国家政治结构的视角。现代化理论一般也被视为社会转型理论,而社会转型的必要条件是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的存在——它能够提供平稳过渡所需要的秩序和制度。然而19世纪中叶的中国,在全球资本主义扩张的态势下,国家主权在一系列和列强签订的不平等协议中受到重创,领土割让、治外法权、关税代管,等等,此即所谓“主权危机”;而国内爆发的大规模反抗运动(太平天国),迫使中央政府不得不依靠地方的非建制的私人武装来应对,从而使地方力量迅速崛起,此即所谓“权威危机”。这两种危机都是分裂的欧洲走向民族国家的现代化中不曾发生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32页。

② 如果不看超过八成的传统产业,只看由制造业、采矿业和公共事业构成的“现代部门”,则旧中国的资本构成,以1947—1948年的数据为例,外国资本占16.84%,官僚资本占43.11%,民族资本占40.05%,三者总计142.45亿元(法币,1936年的币值),其中产业资本(工业资本与交通运输业资本之和)65.5亿元。在产业资本中,民族资本只有16.1亿元,占比不到30%。许涤新、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3卷第6章。民族资产阶级经营的私人经济属于本土资本主义经济,在旧中国是从属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的。

③ Andre Gunder Frank, “The Development of Underdevelopment,” *Monthly Review*, 18(9), 1966; 特奥托尼奥·多斯桑托斯:《帝国主义与依附》,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 Fernando Henrique Cardoso and Faletto, *Dependence and Development in Latin America*, Californi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6.

的——欧洲从分散到整合的历史虽战争不断,却不是固有的“国家主权”被肢解而是作为新概念的主权逐渐现实化的过程,也不是既有的“统一权威”被地方分割而是地方通过军事竞争逐渐形成权威的一体化过程;但在中国,大一统的“疆域国家”^①面临“文明国家”的瓜分之势,“农民的民族”遭遇“资产阶级的民族”的全面碾压,在内外压迫下,中央集权的国家能力(财政能力、军事能力、行政能力)持续衰落,形成了晚清特殊的政治权力结构:中央空虚(权重下移),地方坐大(“督抚专权”)。这种“类封建化”的国内政治结构无法承担起筹划、安排和推进现代化的任务。它的影响一直延续到20世纪上半叶,人们用“国权沦丧”“军阀混战”“政府解体”来概括这个时期的中国政治,显示了这种政治结构的“反现代化”特征,以及国家在现代化面前的历史性困境。

第三,社会组织形态的视角。在内外交困中,中国的国家与社会关系日趋恶化。作为农业社会的组织机制,中国国家与社会的一体化长期依赖于一个特殊的中间阶层充当联结的黏合剂,这就是士绅阶层。士绅阶层以其文化精英的身份成为官僚国家的蓄水池,发挥了国家行政管理人才的录用吸纳作用,又以乡土精英的身份充当“四民之首”,发挥了国家政治统治代理人的渗透整合作用。但是,随着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发展,王朝统治秩序的衰落,这一中间阶层迅速分化解体,一部分流入通商口岸成为软弱的依附性的商业知识阶层,一部分沉淀于基层乡村社会成为土豪劣绅。前者并没有形成所谓的“中国市民社会”,自然也无法构成类似西方市民社会的“现代化的领导精英”,后者则严重恶化了乡村的治理秩序,使乡村原被宗法乡土温情面纱掩盖的土地租佃关系日益具有公开的对抗性性质。中国社会由此陷入低组织化甚或无组织化状态,孙中山将此称为“一片散沙”。现代化在一个低组织化或无组织化的社会形态中是无法进行的,经济和社会的进步在外来势力和本土权势集团的利益关联中也缺乏变革的动力。要改变这种态势,就需要改造中国的社会组织形态;要改造中国的社会组织形态,就需要根本变革包括内外环境在内的中国的政治生态。

于是,“重建具有现代化取向的中央集权国家”就成为19世纪中叶以来中国现代化的重大主题,本质上代表了中国现代化的政治要求。从辛亥革命前后的预备立宪、请开国会,到创建共和、北京政府制宪修宪、多党竞争、联省自治等运动,都可以视为中国现代化欲图克服政治失败的尝试,但这些运动内含着无法解决的矛盾:一方面,它试图效法西方在资产阶级民族国家建构以后实行的自由民主制度和国家结构形式,但这套制度形式恰恰是根植于资本扩张、世界市场和国际分工的逻辑并为其服务的;而中国欲图穿上西方式的铠甲从事自主发展资本主义无异于南辕北辙,既缺乏类似西方市民社会长期演进形成的经济文化基础,也不见容于世界资本主义经济的“中心—边缘”结构。另一方面,这套制度形式在本质上是分权主义的,在中央集权国家已经千疮百孔、武人割据甚嚣尘上的时代,分权主义势必加剧局势的糜烂。当时很多人认为大一统是负资产,中央集权是专制主义,相信“效瑞士之例,自分为数小邦,据联邦之制,以实行民主之权,则其国势之强盛,人民之自由,必可以震古烁今而永为后世万国法者”^②。连革命派的孙中山也不例外,认为“中国革命之目的,系欲建立共和政府,效法美国,除此之外,无论何项政体皆不宜于中国”。但民国建立后,他很快就放弃了原来的主张,提出“保持政治统一,将以建立单一之国,行集权之制,使建设之事纲举而目张也”^③。原因很简单:分权的前提是有权可分,共和的基础是利益与共,这些只有在统一的国家框架中才能满足。在中国的“世界历史时刻”,离开强大的中央集权

① “疆域国家”语出李怀印,指既非一般意义上的征服国家,亦非近代主权国家,而是由多族群组成的拥有固定边界、稳定版图和集中化官僚系统的大一统国家。李怀印:《现代中国的形成:1600—1949》,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2年。

②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第1册,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110页。

③ 《孙中山全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399页。

国家就无法同国际资本谈判议价、通商互利、平等交往,也无法铲除国内割据势力和收服地方利益集团,从而无法实现如《建国方略》所提到的一系列事关机器工业、矿产开发、港口交通、运河疏浚、国土整合、戍边移民以及心理建设和政治建设等内容的现代化建设。

五四运动之后,在苏俄革命的影响下,重建具有现代化取向的中央集权国家获得了新的含义:剪除与西方在华利益相勾连的地方的、分裂的、反动的寄生势力,包括传统的土地权势集团和新生的买办集团及与之勾连的军阀势力(“反封建”);建立现代的、主权的、民主的国家权力机构,联合世界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对抗和打倒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干涉(“反帝”)。这意味着必须对国家和社会进行大规模重组,即从政治入手解决中国现代化的制度性障碍。它的基本行动是:

第一,建立新的大众动员型政党,用政党的力量来克服中国的低组织化状态,用政党的组织网络来完成中国社会的再组织化。中国现代化的总体性危机使人们逐渐意识到,社会的低组织化或无组织化状态是中国现代化失败的主要原因,而较之于其他组织化路径,最直接、最有效、最能代表中国人学习西方民族国家建设经验的努力,因而也最为“现代化”的方式就是组织政党。无论是1924年改组后的国民党还是1921年成立的共产党,都是应对20世纪中国现代化严重危机的产物,它们的组织原则和活动方式都迥然有别于西方式议会型政党,都强调通过集权、纪律和统一意志来贯彻政党的纲领;不同的是,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在理念上更彻底、在组织上更严密、在战略上更坚定、在策略上更灵活、在行动上更有力,因而在和国民党竞争中国现代化的领导权过程中得以全面胜出。^①

第二,发动彻底的社会革命,以阶级斗争的方式颠覆旧制度,打倒阻碍中国现代化的反动力量,改造中国传统的社会结构和保守势力。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是真正的人民革命,革命推翻了三座大山,结束了历史上人剥削人的制度,长期处于无权地位的底层民众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经济社会权利,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的社会阶级结构;公有制经济成分经社会主义改造占据了绝对统治地位,使各劳动阶层拥有了实质性的社会经济权利;虽然还存在差别和贫困,但实现了中国有史以来最大的社会平等。它的土地改革、妇女解放、扫盲识字、同工同酬、劳动保障、教育平权、政治参与为现代化提供了巨大的人力资源。

第三,再造领土完整、主权独立、政治自主的多民族共同体,建构法律、政令、税收、辖制有机统一的政府体系,促进民族的团结融合与边疆的稳定,保障了国家发展与安全利益。中国共产党领导建立起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及其各级政府,不仅深刻改变了世界的格局,而且从根本上扭转了长达百余年的国运颓势,最终奠定了在一个强大的中央权威主导下独立自主、统筹规划、协调发展、全面推进中国现代化的坚实政治基础,卓有成效地回应了资本主义全球扩张时代各大国角逐富强提出的挑战。

二、中国现代化的四个关键要素

中国的现代化无疑是世界现代化的一个组成部分,但也是在中国独特文化传统、独特历史命运和独特国情制约下通过学习与变革、抗争与选择走向现代文明的必然结果,正如习近平总书记

^① 在20世纪特定的内外条件下,国民党政府既缺乏足够的政治权威有效动员资源进行自上而下的现代化,也因其固有的体制缺陷和内部错综复杂的关系而不能实现向理性化的现代国家结构的转变,这和国民党政府是一个与国际资本势力盘根错节的买办性和依附性政权、是一个官僚化的军事性政权、是一个低制度化水平的城市性政权等性质有关。国民党本身在其意识形态衰落、组织结构和功能紊乱、军事政治连连失利的情况下,日趋腐败无能,最终丧失了现代化的领导权。陈明明:《在革命与现代化之间》,《复旦政治学评论》第1辑,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3年,第230—231页。

所指出的：“我们所推进的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国情的中国特色。”^①从政治的角度看，中国现代化至今近两百年，相当长一段时间经历诸多曲折反复，政治失败是其中最深刻的原因，关于这一点，不止是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论著，在罗兹曼等人编撰的《中国的现代化》^②，还有布莱克主编的《日本和俄国的现代化》以及许多西方作者的同类作品中都有过阐述，只不过后者更倾向于商业市民社会的自组织视角，前者则更偏重于政治结构的变革。可以说，在某种意义上，正是由政治失败而引发的理论和实践的探索，以及为解决政治失败而兴起的战略和制度的创新构成了中国现代化的最大特色。它包括以下几点内容：

第一，中国共产党领导构筑的自主国家是中国现代化的决定要素。如上所述，中国的现代化是在主权危机和权威危机的双重危机下起步的。欧洲民族国家形成的历史表明，从分散走向整合不仅是资本主义统一内部市场的反映，也是资本主义通过国家力量建立国际分工机制的要求。在霸权主义和世界资本主义结构中，软弱的政权根本无法把国家的现代化导入竞逐富强的赛道。因此在中国，这个问题很自然就转化为现代国家建构的问题。现代国家的内涵并不是仅仅如同一些西方学者所言的权利保障、代议民主、宪治自由等，而是在与外部霸权及内部分利集团斗争的过程中如何提升和强国国家的自主性及其所反映的国家能力。国家自主性的测度有两个标准，一是国家能否基于国民的、公共的长远利益而提出自己的路线方针政策，而不为短期的、临时的利益所限制；二是国家能否为贯彻公共的长远利益而有力地排除各种集团利益的干扰，而不被特权阶层和权势团体所“俘获”。这又取决于国家由何种力量组成。中国共产党不是西方式的“部分阶层”(parts)欲参政而组建的“党派组织”(party)，而是一个没有自己特殊利益的政党，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永远站在最广大人民群众一边，代表着社会普遍福祉的方向，不会受制于任何强势利益集团。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建设、组织建设和作风建设是其保持高度政党自主性、保持强大政党能力的条件，它缔造了国家，就把自己的信念、特征和机制赋予了造物，所以在中国，国家的自主性由党的高度自主性所支撑，国家的能力由党的强大组织能力所加持。没有中国共产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没有独立自主的国家意志及其排除障碍的国家能力，就不可能在严酷的地缘政治环境和一穷二白的基础上推进中国的现代化运动。

第二，具有强大回应性、问责性机制的有效政府是中国现代化的制度优势。和西方依靠市场企业家精神激励的现代化相比，中国现代化一般被人们视为政府主导型的现代化。政府主导型的现代化所要求的是一个能够维护法制统一、政令统一、市场统一的有效政府，而不是放任市场和资本无序扩张、把发展和繁荣的希望寄予市场能够自动实现自我调节的这种乌托邦式信念的有限政府。实际上，在工业化早期，西方政府就运用立法和强制手段为资本主义经济的运行和发

① 习近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必然要求构建新发展格局》，《求是》2022年第17期。

② 吉尔伯特·罗兹曼：《中国的现代化》，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8年。随着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的启动，现代化成为国家的中心任务，现代化研究适逢其时蓬勃兴起于各大学和研究机构，许多学科纷纷进入现代化或现代性研究领域，涌现出一批以现代化研究为学术领域的专家学者，出版和发表了大批以现代化为主题或主要研究对象的著作、丛书和论文。在现代化研究热中，罗兹曼的这本书因其论述相对系统、视野较为宽阔、观点不无新颖而受到普遍的重视，被历史学、政治学、社会学研究生广泛研读，该书江苏人民出版社多次再版，至今仍有很大影响。20世纪80年代笔者在复旦大学读研究生时，“中国社会政治分析”课程主讲老师开列的阅读讨论书目里就有这本《中国的现代化》，这本书集合国外众多中国问题专家之力，荟萃了当时国外中国现代化研究的最新成果，给国内方兴未艾的关于现代化理论、历史和实践的讨论带来震撼的力量。可是在课堂发言中，大家都有无从说起的感觉，书中的问题视野很大，材料很多，角度特别，叙述节奏也略显冗长，想通过每周只有一两天的阅读（其余时间还有其他课程）而迅速理出头绪一二，无疑是很大的挑战。课上大家无话可说就逼得老师不得不多说，他把书中每一个领域的主要观点都做了概括和分析，行云流水般讲了一节课，许多话已不大记得了，但有一句话至今未忘：读这本书，如果读懂了晚清以来中国现代化运动何以一波三折，根本原因在于政治失败，大体上就算没有白读。

展鸣锣开道(如重商主义政策);到 20 世纪上半叶,西方福利国家的现代化已经离不开政府的干预(如大量使用积极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只不过新自由主义的“有限政府论”对市场经济原教旨主义的偏好有意无意淡化或掩盖了经济增长中的政府作用。有限政府对国家的“有限接受”仅在于承认国家对产权制度的保护功能,此被认为是经济增长的关键,而对国家的“无限怀疑”则是骨子里认为国家的利维坦基因最终会成为经济衰退的根源。与此不同,有效政府对国家的充分肯定建立在“国家是文明社会的概括”^①的历史认识上,人类要克服生存和发展的不确定性(危机和风险)、要积累和发展文明的成果,势必形成有效的中央权威组织及其秩序,以控制社会冲突,协调统筹安排包括市场制度在内的经济社会生活。尤其在一个竞逐富强的时代,谁组织得最好、结构最合理、规划最科学、力量最集中,谁就更容易胜出。这正是早期中国现代化何以失败给中国人最大的启示。

有效政府具有强烈的发展导向,把“发展就是硬道理”视为基本理念,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视为行动战略;有效政府承认和理解市场是配置资源的决定性机制,同时深刻认识到政府在市场经济中不可或缺的作用,采取顺应市场经济规律的国家干预经济方式,实行市场和政府的双轮驱动;有效政府重视国家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引领功能,充当经济导航机构,编制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制定经济产业政策,领导协调经济活动,统筹经济社会发展,从宏观到微观践行国家意志,推动经济和社会公共生活按照国家认为的最优方向前进。有效政府的“能”使人们想到它会不会是一个自专任性的政府,其实,在中国,“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②已经表达了有效政府的制度约束和价值逻辑,即有效政府的“有效”是以政府的回应性和问责性为其权能基础和行动边界的,回应性体现了政府权力的有效行使(接收民意、倾听诉求、制定规划、识别正误、整合利益、积极行政),是一个能动的政府;问责性体现了政府在人民监督下的有效履责(政务公开、可置信承诺、监督落实、依法行政、依责问政、引咎辞职),是一个节制的政府。回应性和问责性相统一的有效政府模式,本质上来自中国经济快速平稳增长的历史要求,既是中国现代化所强调的国家自主性和国家能力在政府治理模式上的反映,也是解决超大国家条件下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和应对各种现代化风险的制度优势所在。

第三,持续的社会革命创造的平等社会是中国现代化的动力基础。中国现代化是一个深刻的社会革命过程,革命把散失的中国社会重新组织起来,更重要的是改变了中国社会的不平等。有人可能认为革命消灭了中间阶层(士绅阶层),使国家与社会关系失去了必要的联结与黏合,但事实并非如此。首先,这个中间阶层的消失不是革命的直接结果,起自晚清的现代化运动已经催化和加剧了这个阶层的分化,换句话说,无论有没有后来的国民革命,这个阶层的衰落都是历史巨变不可避免的结果。其次,这个阶层的分化造成乡村秩序的恶化,加剧土地与阶级关系的紧张和对抗,革命对土豪劣绅和传统宗法势力的扫荡,对土地分配不平等关系的改造,是现代化(新质代换旧质)的题中应有之义,它的本质在于解放生产力。再次,革命从乡村到城市、从经济到社会,把大多数原被排斥于政治之外的人口纳入政治之中,实现了历史上最广泛的政治参与,构成了中国现代化最深刻的国民动员(启蒙和唤醒),正是“社会梗阻”的清除使国家与社会实现了新的有机整合。

社会革命带来的空前的社会平等对中国意味着什么?是解放唤起的“翻身”感觉,是平等唤起的“主人”尊严,是自主唤起的“当家”热情,是参与唤起的“新国民”意识,这些都转化为现代化

①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195—196页。

②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年,第385页。

的巨大动力。跨国实证研究已经证明,不平等与随后的经济增长呈负相关关系,而比较平等的社会,后续经济增长较快。^① 在一个相对平等而流动的社会,普通人通过奋斗也能实现梦想,而一个由少数人垄断资源的不平等的社会,普通人实现梦想的可能就非常渺茫,这就是平等对效率的正向激励。从宏观来看,不平等的社会无法支持经济的可持续增长,因为巨大的社会鸿沟和严重的“相对剥夺感”造成社会的尖锐对抗,社会的进步被社会的成本抵消,以致现代化的成果难以积累。拉美和南亚一些国家的现代化进程辗转反复,动荡波折,其重要原因之一恰恰是缺乏一场深刻的社会革命^②,以致两极化的社会结构阻碍了广泛的经济转型。相反,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现代化成就,追根溯源则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土地关系的革命改造,如果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开始以前,土地不是集体所有,土地分配关系是严重的不平等,包产到户恐怕只会导致阶级矛盾的激化,不可能取得任何成果,农村改革不能起步,何谈后来的城市改革。^③ 这也是为什么改革开放后中国共产党早期提出“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而后则越来越强调“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更加注重社会公平”的原因。在一个经过社会革命清理的地基上,平等的社会结构是现代化的不可或缺的激励机制。

第四,以治理中心主义支持国家的可持续发展是中国现代化的重要途径。中国在克服现代化危机、重建法制统一、政令统一和市场统一的中央集权后,国家治理便成为现代化的基本主题,虽然由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地缘政治压力和指导思想偏差而经历过政治的动荡时期,但通过国家治理(治国理政)以实现国家繁荣昌盛、长治久安一直是党和国家的最高战略目标,它构成了中国现代化的深层政策文化,可称之为“治理中心主义”。治理中心主义植根于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是一种旨在通过国家超越资本力量、实现资源回归社会、回归人民的整体性制度安排和价值主张^④,其内核是以人民为中心,把人民的根本福祉作为党和国家各项方针政策的出发点和归宿。治理中心主义坚持社会主义的平等原则,同时对经济运行的效率原则给予充分的重视;坚持社会主义的共享发展目标,同时也深刻认识到“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是实现共享发展的必经之路;坚持社会主义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同时也在加强中央集权国家体制能力的前提下实行国家权力体系和中央地方关系的功能性分权。按照治理中心主义,评价一个国家的现代化是否成功,政治上不仅在于人民是否行使选举权和监督权并得以按照法定程序对公职人员进行自由的选择,而且在于人民能否实质性地全过程地拥有对公共事务的决定权和参与权;经济上不仅在于市场经济法则是否确立了它在资源配置方面的决定性地位,而且在于市场经济机制能否为增强综合国力和人民共同富裕创造最好的绩效;社会生活上不仅在于是否建构完整的公民权利体系以保证社会的自由表达、自由交往和自主创业,而且在于能否切实形成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公平正义、增进人民和民族团结、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的公共生活。

治理中心主义在当代中国现代化中具有强大的发展效应。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人均国民收入不足 30 美元,平均预期寿命仅为 35 岁,成人识字率只有 20% 左右,绝大多数人口是文盲,婴儿死亡率高达 200‰。经过 70 多年的发展和治理,到 2020 年,人均国民收入已经超过 1 万美元,平均预期寿命提高到 77.3 岁,15 岁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达到 9.9 年,婴儿死亡率降低到 5.6‰。以世界性难题——反贫困为例,中国的减贫过程是一个典型的治理故事:中国曾是世

① 林春:《再议土地改革:中国和印度的启示》,《开放时代》2016 年第 2 期。

② 例如摩尔认为,“造成印度长久落后的主要原因”是“缺少一次与过去彻底决裂的革命”。巴林顿·摩尔:《专制与民主的社会起源》,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 年,第 445 页。不局限于印度的类似判断还见诸该书第三部分(推论)各章。

③ 王绍光:《中国崛起的世界意义》,北京:中信出版社,2020 年,第 89 页。

④ 刘建军、陈周旺、汪仕凯:《政治逻辑: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政治学》,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2 年,第 39 页。

世界上贫困人口最多的国家,改革开放后,政府实施开发式扶贫政策,从开始针对因地理环境和机会缺失等原因影响发展的贫困地区,逐步转化为针对贫困人口,经历了瞄准区域到瞄准县级再到瞄准家庭的精准扶贫过程,在经济转型和经济发展前提下,通过社会救助、社会保险、社会福利等政策,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和速度使近 8 亿人摆脱了绝对贫困,脱贫人口占到了全球贫困人口的 75%,为全球减贫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

中国农村改革提供了另一个系统性治理的典范:改革所以从农业部门起步,是因为在经济学意义上该领域的贫困人口可以直接受益于与引入市场激励机制相关的生产力的提高,低技能要求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为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提供了就业机会,城镇化进程有助于农民工利用城市新机会,其向农村家庭的转移支付又提高了留在农村家庭的收入。此外,政府投资的基础设施,改善了农村地区的生产生活条件,实现了农村、城市和出口市场的互联互通,农业人口的有序流动和城镇化带动了现代化的快速发展。治理中心主义的政策推行,使中国的人类发展指数(HDI)在教育、健康和收入方面有了大幅度的改善,2022年的HDI排名79位,虽然与“极高人类发展指数”国家相比仍有很大差距,但已进入“高人类发展指数”行列。显然,中国的成功得益于有效的治理,而有效治理是中国现代化得以快速持续发展的关键。

三、中国式现代化的内涵扩展与世界意义

在习近平总书记所作的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中国式现代化”是一个分量极重的内容。事实上,这并不是一个近几年才出现的概念,早在 20 世纪 70、80 年代,“中国式的现代化”或“中国式现代化”便已见诸报端。1979 年 3 月 21 日,邓小平会见英中文化协会执行委员会代表团时说:“我们定的目标是在本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我们的概念与西方不同,我姑且用个新说法,叫做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①同年 10 月 4 日,又说:“我们开了大口,本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后来改了个口,叫中国式的现代化,就是把标准放低一点。特别是国民生产总值,按人口平均来说不会很高。”^②这个“放低一点”的标准就是“小康社会”。同年 12 月 6 日,邓小平在会见日本首相大平正芳时说:“我们要实现的四个现代化,是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我们的四个现代化的概念,不是像你们那样的现代化的概念,而是‘小康之家’。”^③五年以后,1984 年 3 月 25 日,邓小平在会见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时又说:“翻两番,国民生产总值人均达到八百美元,就是到本世纪末在中国建立一个小康社会。这个小康社会,叫做中国式的现代化。翻两番、小康社会、中国式的现代化,这些都是我们的新概念。”^④在这里,“中国式的现代化”有道路、制度构设的含义,但主要是同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和人均 GDP 联系起来界定的,实际上表达了开创基业的一代共产党人欲“使中国由农业国变成工业国”的宏愿,^⑤邓小平说它是“新概念”,是因为从 20 世纪 50 年代到“文化大革命”期间党和国家数度提出实现这个宏愿的四个现代化目标具有浓厚的超越论色彩,却缺乏对本国与发达国家深刻差距的理性认知和实事求是的发展方略,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翻两番、小康社会”则把中国由不切实际的目标设定拉回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现实起点,开始了新时期按照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的逻辑推进“四个现代化”的并列式发展。

时移世易,换了人间。如果单就 20 世纪 80 年代“翻两番、小康社会”的标准,中国早已超额

① 《邓小平年谱(一九七五—一九九七)》(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496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94页。

③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37页。

④ 《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54页。

⑤ 《毛泽东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081页。

完成了“中国式现代化”。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工业人口只占总人口的0.4%,工业产值约占全国经济总量的10%,新式产业(排除农业和手工业的现代工业及公共事业等)仅占工农业总产值的17%。^①到2016年,除受自然资源禀赋限制的原油外,中国很多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已经排在世界第一,如钢、煤、发电量、水泥、化肥、棉布、化学纤维等。在21世纪前后十年间,1990年,中国制造业占全球比重2.7%,居世界第九;2000年上升为6%,居世界第四;2007年达到13.2%,居世界第二;2010年占比高达19.8%,超过美国;2017年,中国已经占到全球制造业增加值的28.6%。^②中国的工业化前30多年艰难起步,靠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以年均8%的增长初步改变了国家一穷二白的旧貌,后40年靠改革开放,在超过四分之三的时间内创造了年均近两位数的增长,实现了从生产力相对落后的状况到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的历史性突破,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器和稳定器。70年前,中国是典型的农业国,70年后,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一制造大国。

中国现代化事业是一个不断推进和拓展的过程。2020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上提出“中国式现代化”,继承和发展了“中国式的现代化”的历史内涵,不仅在表述上更简洁,而且在概念上更鲜明地揭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本质和方向。显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式现代化”已经不是或主要不是指建立强大的工业化国家和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这已经基本完成),不是单纯的数量指标问题,而是在推进和实现现代化这一历史巨变中,中国在理论基础、内在价值、运动机制和时代特征等方面的伟大创新对于人类现代化的重新思考,是一个在历史提供多种可能性面前的道路、方向选择的政治哲学问题。它的要义是:我们究竟要的是一种什么样的生活?我们将通过什么样的途径来实现我们所要的生活?我们创造的生活方式和路径对人类的文明和进步意味着什么?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包括五个特征的现代化:(1)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巨型社会的);(2)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共享发展的);(3)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协调推进的);(4)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绿色生态的);(5)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和平崛起的)。同时指出,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是: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高质量发展,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毫无疑问,中国式现代化不仅是物质财富总量增长、科学技术创造的过程(这凝聚了几代人梦寐以求的富强梦想),而且意味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制度的成熟定型(这是改革开放40余年解放思想、积极探索的奋斗成果),还是一个深刻的革命性的人类文明新形态建构的社会进步过程(这超越了现今现代化理论研究的视野和现代化方案的设定)。

从现代化的政治与历史之维观之,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表明,现代化的推进必须有一些关键因素作为支撑,缺乏这种支撑,现代化就难以成功。这些关键因素如前所述即自主国家、有效政府、平等社会、治理中心主义政策。没有一个自主国家,现代化只能是一种在既有世界经济政治结构束缚下的依附性发展;没有一个有效政府,现代化只能是一种受制于自然禀赋,依赖自发市场条件的力量分散的低水平发展;没有一个平等社会,现代化只能是一种被丛林法则支配的两极化发展,没有一个治理中心主义政策,现代化只能是一种非均衡的跛足式发展。这就是中国现代化对于世界的普遍意义。

中国现代化的特殊性质只在于,是什么样的政治力量和制度机制支持了这些因素的存在及

① 许涤新、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756页。

② 王绍光:《中国崛起的世界意义》,第251页。

其作用的充分发挥?答案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人民至上的性质和组织特性造就了自主的国家,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原则支持了有效的政府,深刻的社会政治革命带来了平等的社会,治理中心主义的文化理念和政策推动了可持续的协调发展。就此而言,它的确是中国特色的。

中国人并不企图把自己的制度和体制推向世界,中国人比任何民族都更能接受多元主义的观点,“物之不齐,物之情也”是中国传统文化信奉的观念之一,任何制度要生根落地,都是一定“历史—社会—文化”选择的结果,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人缺乏普遍主义的意识,所谓“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在这个意义上,中国人的智慧和思维特征是“多元—普遍主义”。按照“多元—普遍主义”,现代化有不同的民族和文化特点,有不同的政治理想追求,但最大的公约数不外乎富足、安全、自由、尊严以及能满足这些理想的有序的公共生活。现代化有不同的发展道路,但通向现代化的理想境界总有一些绕不开的方式方法。对于许多不发达国家来说,可以没有共产党领导,但要想摆脱外部经济政治霸权和内部利益集团的掣肘来谋求发展振兴,拥有一个自主的国家是必不可少的政治前提;可以不搞社会主义,但要想发挥比较优势动员资源进入快速发展通道,依托一个有效的政府是事半功倍的成功关键;可以不经过深刻的社会革命,但很可能必须容忍社会不平等对效率、增长的减损和畸形繁荣(如果有的话)对国家的潜在危害;也可以不必把治理中心主义作为一种文化,但恐怕得把社会的病态当作一种审美的常态,把经济转型和社会成长寄托于漫长的时间(只要等得起)。

作为一个背负着千年光荣与梦想的民族、19世纪中叶以后沦为现代化的后来者、被百年耻辱和民族自尊交相煎熬的文明大国,中国总有那么一群人不肯沉沦、不肯放弃、不愿等待、不怕失败,于是发动群众、组织起来、奋发图强、独立自主、实行赶超,从而开始和推动了中国的现代化。在此过程中,是共产党的领导、社会主义的制度、社会革命的导向、平等社会的价值、治理中心主义的政策,带来生产力的解放,支持了中国的现代化。中国的体制、经验和方案同现代化的一般必要条件和逻辑具有内在的亲亲和关联性——它是特殊的,又是普遍的,是中国的,又是世界的。正如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的决议》所指出的:“党领导人民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①这就是中国之路、中国之治、中国之理留给这个千帆竞发而又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的思考。

作者单位:陈明明,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上海市,200433)

(责任编辑 徐楷森 朱路遥)

①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年,第64页。

Abstracts

Factors Leading to Chinese Modernization: Historical and Political

CHEN Ming-ming

China's modernization since the late Qing Dynasty started when the capitalism expanded itself worldwide. As a result, this nation's sovereignty and political authority were lost, and the society was disordered. The exploration of Chinese modernization is thus a result of the theoretical explorations and their practices urged by political failures, and the strategic social projects and revolutions that have been intended to save the nation. The experience of China's modernization shows that it is indispensable for this nation to be independent and egalitarian with socialist system, and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a strong political party and an efficient government in a governance-based policy culture, if it hopes to be successful in its modernization. The systems, experience and projects of the Chinese modernization reflect not only the generalities of modernization of different countries, but also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based on history and national conditions, with a meaning, both particular and universal, to China and the world as well.

Confucian Ideal Personality of “Inner Sage and Outer King”: Two Types and Their Development

LI Xiang-jun

In the perspective of the pre-Qin Confucian principle of being “inner sage and outer king”, there are two types of ideal personality: self-created and self-identified. In Confucianism of the Han Dynasty, the self-created personality was never allowed to go beyond Confucian ethical code, and a wary eye was always kept on the moral cultivation of the self-identified personality. The ideal personality of neo-Confucianism in the Song and Ming Dynasties indicated a trend of transformation from the self-created to the self-identified, and further strengthened its intrinsic virtue and potentiality for transcendence. Modern neo-Confucianism has attached great importance to the principle of being “inner sage and outer king”, showing a tendency of focusing the self-created in the discussion of ideal personality under the sway of the times. The interactive reinforcement of the self-created and self-identified personalities is an inevitable path to follow in realizing